

从北魏对河套地区的经营看农业文明 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薛瑞泽

(河南科技大学 河洛文化研究所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 北魏对河套地区的经营从军事占领开始,随着鲜卑族势力的增强,北魏开始在河套地区发展农业经济,加速了鲜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北魏对河套地区的管理实行军镇和地方行政机构并行的方略,以军镇管理为主。随着北魏政治中心南迁洛阳,军镇地位逐步下降,并最终为郡县制所代替。从《敕勒歌》到《木兰辞》乃至后来的《李波小妹歌》都反映了两种文明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 河套地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5-116/C(2007)03-0026-05

北魏作为鲜卑族所建立的政权,其形成和发展与中原地区的社会历史相伴而行。鲜卑族在北方地区的发展与依赖黄河流域经济带的逐步开发是密不可分的。具体而言,鲜卑族进入黄河流域后,在与黄河流域农耕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吸收农业文明的长处,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发展,使北魏社会积聚起了雄厚的实力,为进入中原打下基础。

一、北魏前期对河套地区的经营

鲜卑族早期活动在东北地区,东汉时期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并参与东汉政府抗击匈奴的战争。鲜卑族势力的强大与东汉中后期匈奴势力的衰落有很大的关系。^[1]随着鲜卑族的势力逐步强大,鲜卑族替代匈奴族成为东汉北部边疆新的威胁力量,开始进攻东汉的沿边州郡,并进入河套地区。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九月,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联合,“败五原郡兵于高渠谷”^①[2]卷5《孝安帝纪》。高渠谷在五原郡,说明鲜卑族进入河套地区。汉安帝末年,鲜卑大人其至鞬部落迅速强盛起来,“控弦数万骑,数道入塞,趣五原曼栢,攻匈奴南单于,杀左奥鞬日逐王”,占据五原地区。^[3]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书》。汉顺帝永建七年(132年)十一月,“鲜卑寇朔方”,再次以武力进入河套地区。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七月,鲜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大规模进攻“缘边九

郡”,檀石槐部迅速强大起来,形成了“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的态势。建安年间,鲜卑族更加强盛,“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3]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东汉时期,鲜卑族虽然进入河套地区,但多是以武力方式进入,鲜卑族在这一时期还是游牧民族,游牧射猎是其主要生活方式,与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的联系仅仅只是朝贡与战争的关系。

鲜卑族拓跋部进入河套地区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拓跋力微初期率众居住在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县一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势力迅速强大,“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始祖三十九年(258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这时鲜卑族拓跋部进入河套地区的前套,拓跋力微在南进过程中,其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对鲜卑族诸部大人说:“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讎,百姓涂炭,非长计也。”^②[4]卷1《序纪》。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与黄河流域农耕民族交往的重要性。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才在魏晋之际两次派遣沙漠汗到洛阳接

[收稿日期] 2007-09-09

[作者简介] 薛瑞泽(1962-),男,河南灵宝人,河南科技大学河洛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

受汉文化。而沙漠汗最后在回部落途中被部落大人杀死则表明鲜卑族拓跋部守旧势力仍然没有真正接受农业文明。

拓跋禄官在位期间,将拓跋部一分为三:“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拖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这次分离部落,使拓跋部的势力迅速增强,猗卢从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4]卷1《序纪》进一步说明拓跋部已经控制了河套地区,不过拓跋部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将其他少数民族迁往河套地区,使这里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

西晋末年,在中原地区遭受八王之乱灾难的同时,河套地区也反复被兵火所侵袭。拓跋禄官死后,拓跋猗卢总摄三部。永嘉四年(310年),拓跋猗卢派遣其侄子拓跋郁律帮助刘琨打败白部鲜卑,随即进攻盘踞河西地区的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河套地区又为刘虎所占领。因帮助刘琨有功,拓跋猗卢趁机扩大占有的地区,刘琨“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陞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拓跋猗卢实际控制的地区“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4]卷1《序纪》刘虎则不时地从朔方出兵骚扰。在拓跋什翼犍时期,拓跋部多次打败刘卫辰(刘虎之孙)部落。什翼犍晚年,苻坚灭代,并将代国分为东西二部,其中黄河以西之土地、部众归卫辰所属。卫辰虽不久再度因叛秦而为秦军所败,惟苻坚仍以卫辰为西单于,统率黄河以西诸民族。淝水之战后,卫辰久居朔方(即黄河以西之河套),兵强马壮,成为不少势力拉拢的对象。

道武帝拓跋珪继位后,鲜卑族拓跋部在十年间仍然处于弱小的地位。登国元年(386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会集部落民众于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二月,拓跋珪率领部落民众至盛乐,并于此进行了北魏历史上重大的改革,“息众课农”,加速鲜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随后,拓跋珪东征西讨无暇顾及发展农业经济。登国六年九月,拓跋珪占领了被刘卫辰占据的五原。“收其积谷,还纽埒川(今内蒙古文不盖河)。”到了十二月,“自河已南,诸部悉平。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登国九年三月,拓跋珪“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柁杨塞外”。^[4]卷2《太祖纪》《拓跋仪传》亦载,“命督屯田于河北,自五原至柁杨塞外,分农稼,大得人心”,可见汉族地区的

农业经济赢得了鲜卑部落民的普遍欢迎。然而,北魏在这里发展农业经济受到来自鲜卑族的另一支慕容垂后燕军队的骚扰。慕容垂从登国十年七月派遣其子慕容宝进攻五原,“造船收谷”。双方在这里僵持了两月之久,拓跋珪在十一月的参合陂之役打败慕容宝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农业生产的成果。

在取得了农业发展以后,拓跋珪开始吸收汉族地区成熟的封建制度,“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4]卷2《太祖纪》由此可见,占领五原地区以后,北魏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广泛吸收农业文明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施行汉族地区的政治制度,表明农业文明的影响已经深入到鲜卑民族的灵魂深处。是后,拓跋珪所进行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举措可以说都是在五原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继续。天兴元年正月,平定慕容氏后,“分徙吏民及徙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后比岁大熟,匹中八十余斛”。^[4]卷110《食货志》如果按此类推,四方四维所设置的八部帅管理农业经济的发展,那么,河套地区当也在此范围之内。在太武帝时期,北魏已经占据河套地区,太武帝多次到河套地区巡视,始光三年(426年)六月,太武帝“西至五原,田于阴山;东至和兜山”。四年正月,为了讨伐赫连昌,太武帝“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神鹿二年(429年)十月,“列置新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4]卷4上《世祖纪上》这些新民迁居河套地区对于这里经济结构的改变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加速了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因为阴山地处屏蔽河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所以从太武帝开始,北魏诸帝频繁到阴山巡视。延和二年(433年)十二月,“辛未,幸阴山之北”。太平真君元年(440年)七月,行幸阴山。太平真君四年,太武帝至阴山巡视,六月,发布诏书:“朕承天子民,忧理万国,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义。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扬恩德,勤恤民隐,至乃侵夺其产,加以残虐,非所以为治也。今复民货赋三年,其田租岁输如常。牧守之徒,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得妄有征发;有

司弹纠，勿有所纵。”^{〔4〕}卷4下《世祖纪下》这样一来，黄河河套地区的农业经济必然得到发展。正因为河套地区的重要性，太武帝在位时期共10次至阴山巡视。文成帝时期也有8次巡视之举。孝文帝有3次巡视阴山的举动。特别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八月，已经完成迁都的孝文帝仍然至巡视阴山。

从北魏早期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鲜卑族早期的发展与占领河套地区有很大关系。正因为占据了河套地区，并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水利灌溉便利发展农业经济，促使了鲜卑族开始摆脱原始部落发展的羁绊，开始向农业民族迈进。

二、河套地区军镇的设置所折射的两种文化的融合

占领河套地区以后，北魏政府为了加强了对河套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融合两种行政体制的方略进行管理，既有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也有采取军镇管理的方式，并且以后一种方式占主要地位。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北魏在河套地区设立代名郡，下设呼酋县，在太和二年又设渠搜县。因为史书记载的缺失，见诸记载的郡县设置仅此而已。河套地区因为地处抵御北部边境柔然进攻的战略桥头堡位置，北魏同时在河套地区设置沃野镇、怀朔镇和武川镇和抚冥镇等四个军镇。四个军镇位于北魏沿边军镇的中心地带，西部与薄骨律镇相接，东部与柔玄镇相连。这四个军镇的设置，一方面是北魏在沿边地区设立军镇加强控制的体现，另一方面，军镇采取军事化管理，也有利于农业经济在边疆地区特殊的环境下继续发展。

沃野镇作为北魏北部边镇之一，是北魏防备柔然进攻的战略要地。这里是北魏时期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一个地区，北魏在这里驻扎军队以镇抚之。延兴元年（471年）十月，沃野镇和统万镇的柔然叛乱，北魏朝廷派遣陇西王源贺率军追击，至枹罕镇平定了柔然叛乱，“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民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4〕}卷7上《高祖纪上》。足可以看出这里也是柔然的聚居地。因为北魏在这里驻扎大量军队，河套地区所产粮食难以满足军镇所需，粮食供应问题非常紧张。太和七年（483年），朝廷命令薄骨律镇将刁雍“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刁雍认为采取大规模陆路运粮“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建议朝廷允许他建造运船通过黄河水道将粮食运到沃野镇，可以实现“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功，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的效果。朝廷认为他的建议“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卿镇可出百

兵为船工，岂可专废千人？虽遣船匠，犹须卿指授，未可专主也。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4〕}卷38《刁雍传》刁雍主持此事，沃野镇的粮荒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初，对北部军镇还是很重视的，他曾在太和十八年（494年）八月，“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4〕}卷7下《高祖纪下》然而，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河套地区的军镇逐步衰微，边镇守将处境尴尬，难以升迁，矛盾逐渐激化，并引起了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起兵反叛。正如广阳王元渊所言：“边竖构逆，以成纷梗，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士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有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过弄官府，政以贿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为此，无不切齿憎怒。”^{〔4〕}卷18《太武五王·广阳王传》军镇的守将由拓跋珪时期的高门子弟担任，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因难以升迁而贪贿成风。元渊所描述的矛盾在当时北部边镇普遍存在，如于祚在太和年间任沃野镇将时，因“贪残多所容纳”被源怀上奏免官。^{〔4〕}卷31《于栗磾传附于祚传》再如怀朔镇将元尼须虽然与源怀为旧交，但因“贪秽狼藉”，也被上奏免官。^{〔4〕}卷41《源贺传附源怀传》虽然有源怀这样的官员对边地镇将的腐化问题加以遏制，但不能从跟上解决问题，故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叛浪潮。

因为中央政府不再重视，再加上河套地区自然灾害严重，民生问题受到严重的威胁。《魏书》卷一百一十二上《灵征志》记载，太平真君八年（447年）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太和二年（478年）七月庚申，“武川镇大风，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往。”正始元年（504年）五月壬戌，“武川镇陨霜”，随之“武川镇大雨雪”。“六月辛卯，怀朔镇陨霜”。永平二年（509年）四月辛亥，“武州镇陨霜”。农历四五月份正是农作物生长茂盛的时期，而接连不断

的霜灾和雨雪天气对农业的影响甚巨。特别是沿边地区遭受的旱灾已经威胁到民众的生存问题。“自京师迁洛，边朔遥远，加连年旱俭，百姓困弊”。景明二年（501年），源怀上表说：“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菑亩。”自然灾害加上镇将专擅良田，“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源怀建议：“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北镇边蕃，事异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别。沃野一镇，自将已下八百余人，黎庶怨嗟，金曰烦猥。边隅事鲜，实少畿服，请主帅吏佐五分减二。”源怀的建议被采纳后，出现了“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而源怀有关建议就有四十余条。^[4]卷41

《源贺传附源怀传》正因为自然灾害加上镇将的占据肥美的土地，使民众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有鉴于此，永平二年（509年）四月，宣武帝“诏以武川镇饥，开仓赈恤”。对沿边各族也不再施以优惠的民族政策，“并敕缘边州镇，自今已后，不听境外寇盗，犯者罪同境内。若州镇主将，知容不纠，坐之如律”。^[4]卷8《世宗纪》为了保证灾民渡过灾荒，宣武帝对擅自开仓放粮的官员也不加追究。延昌初年，“武川镇民饥，镇将任款请贷未许，擅开仓赈恤，有司绳以费散之条，免其官爵。（李）平奏款意在济人，心无不善，世宗原之”。^[21]卷65《李平传》总而言之，到北魏后期，北部军镇已经积重难返。

正因为北部边镇在北魏王朝的作用越来越轻，所以到孝明帝时期将军镇改为州。《魏书》卷八十九《酈道元传》云：“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如果说军镇的存在是北方游牧文明的代表，那么，到了北魏末年，军镇的存在已经不适应北部沿边的社会情况，所以，孝明帝及时地废弃了军镇制度而代之以郡县制度，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也表明农业文明最终取代了游牧文明。

三、民歌多反映的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

流传至今的《敕勒歌》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象征。“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无疑可以从更广的层面为我们提供鲜卑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河套地区的活动的历史信息。

我们知道，敕勒川位于阴山脚下，经过北魏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这里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区^[5]而鲜卑族、敕勒族等少数民族在这里依靠黄河的灌溉，畜牧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敕勒歌》所描述的就是北魏以来河套地区农牧业经济发展的盛况。关于《敕勒歌》的流传，《乐府广题》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悲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¹《敕勒歌》本用鲜卑语传唱，改用汉语传唱后，其句子长短不齐，但因立意高远，千百年来成为大漠风情的真实映照。这说明《敕勒歌》作为鲜卑语早期流传于鲜卑族的民众之中，在公元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东魏和西魏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之战中，高欢为了激励士气令斛律金吟唱使《敕勒歌》得以流传。

正因为《敕勒歌》的长远影响，所以《敕勒歌》成为后人描述河套地区景象的典范而被多次引用。唐人温庭筠《敕勒歌塞北》诗云：“敕勒金帟壁，阴山无岁华。帐外风飘雪，营前月照沙。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却笑江南客，梅落不归家。”^[6]卷3这也是借《敕勒歌》描述河套地区风土人情的写照。元好问《诗评 敕勒歌》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恢宏大气，无疑是怀古寓今。即使到清代有关诗句言及《敕勒歌》者也不时见诸文人笔下。李祁《敬书宸翰后》云：“龙归卧北溟波，愁绝阴山《敕勒歌》。惟有遗珠光夺目，万年留得照山河。”^[7]甲集前编第六程敏政《题戎马出猎图》：“共想熊掌炙驼峰，《敕勒歌》长出林藪。歌长昼短乐未央，皂旗闪烁天苍凉。”^[26]丙集第六吴伟业《雪中遇猎》中有“漫唱千人《敕勒歌》，只倾万斛屠苏酒”之句。^[8]卷1所有这些后人关于《敕勒歌》的描写无疑是这种文化精神的流传。

在《敕勒歌》之前流传的《木兰辞》也反映了北魏时期河套地区的社会风情。据学术界研究，《木兰辞》所发生的背景是北魏抵御柔然入侵的战争，约作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从诗文“旦辞爷娘去，暮至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分析，木兰从军所发生的地点黑山即在今河套地区。关于黑山今天的具体地点，有多种说法，一说黑山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一说黑山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杀虎山，无论哪一种说法，黑山均在河套地区。燕山指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而木兰历经十余年的

战争，才回到故乡，“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篇叙事诗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描写得淋漓尽致，展示了北魏女性的参与社会活动的雄浑气魄。与此相比的《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14]卷53《李孝伯传附安世传》所展现的也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河北广平（今河北省鸡泽东南）女子的精神风貌，与《木兰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这里引用李波及其小妹之事虽然发生在广平郡，但无疑可以看作北方地区女性群体的代表人物。她的身上体现了北方民族勇敢尚武的民族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应该与西晋末年以来北方民族的相继南迁有关。这些民族已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他们大都已接受农业生产方式。但毫无疑问畜牧业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河北地区的骑射之风便是在民族错居长期接触交往中形成的”。这也可以看作包括河套地区的游牧文明对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影响。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言：“河北境内骑射之风的流行，反映了晋末以来内迁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巨大影响。”^[19]120

综合全文所论，我们认为，北魏时期河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明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重要地区。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在这里碰撞和交融，构成了河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从北魏早期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鲜卑族为代表的草原文明逐步融入进农业文明的过程，也可以从北魏军镇设置的演变看出农业文明最终在河套地区占据优势的历史进程。而以《敕勒歌》和《木兰辞》乃至后来的《李波小妹歌》为代表的游牧文明的文字

记载，则更显现出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

[注 释]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四·歌辞四》。《容斋随笔》卷一《敕勒歌》记述《敕勒歌》的流布过程云：“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显。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卒之间，语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案《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恚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清·吴騄《拜经楼诗话》卷二云：“古乐府《敕勒歌》，《乐府广题》云：‘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多死。神武恚甚，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此歌，神武自和之。’予按：史言金不知文字，改名曰金，犹苦难署，至以屋山为识。则金焉能为此歌？故梅鼎祚疑古有此歌，神武当时或令金唱之，以安众心耳。沈归愚选《古诗源》，直以为斛律金作，虽仍《碧鸡漫志》等之伪；而引《北史》云云，《北史》实无是语也。”

[参考文献]

- [1] 唐长孺. 拓跋族的汉化过程[C].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4]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薛瑞泽. 汉唐间河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C]. 河套文化论文集(第二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 [6] 温廷筠. 温飞卿诗集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7] [清] 钱谦益. 列朝诗集[M].
- [8] [清] 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M].
- [9] 唐长孺. 读《李波小妹歌》论北朝大族骑射之风[C]. 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The Exchange between Nomad 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as Shown in the Operation of Hetao Area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Xue Ruizhe

(He-Luo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471003)

Abstract : Exploitation of Hetao area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began with military occupation. As power and influence of the Xianbei nationality increased, North Wei Dynasty started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Hetao area. This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Xianbei economy from being nomad to being agricultural.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of this area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was both military and civic, the former being in the main. Later, when the political center moved to Luoyang in the south, the militariness of its government decreased and gave way to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This is reflected in “Song of the Shele”, “The Ballad of Mulan” and “Songs of the Young Sister of Li Bo”.

Key words : Hetao area; nomad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张慧)